

---

---

# 中日关系的辩证解析

冯昭奎

**内容提要:** 中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是周而复始的矛盾运动过程。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日矛盾日趋激化,到了2014年两国矛盾激化到“不能再激化”的危险局面。中日政府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和首脑会见,使两国关系持续两年多的空前严峻局面迎来重要转机。2015年的中日关系应是“安静”便好,切实遵循和落实四点共识,推动两国关系走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轨道。要大力加强中日民间交流,防止两国政治、外交层面的矛盾扩大为两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与相互仇视。还要大力加强中日环保合作,促使环境问题等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成为连接两国的友好纽带。更重要的是解决中日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使所谓“中日必有一战”成为“中日创新之战”。

**关键词:** 中日关系 辩证法 民间交流 环保合作 战争与和平

**作者简介:** 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874 (2015) 01-0001-24

中日两国在亚洲构成一对复杂、多变、难解难分的矛盾。中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就是一次次地产生矛盾,一次次地缓解矛盾,又一次次地面对矛盾上升、激化、缓和的周而复始的矛盾运动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一个也没有彻底解决过。中日矛盾不仅经历了时缓时紧的起伏,也经历了矛盾主次的移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问题、贸易摩擦、领土争端相继成为最突出矛盾——甚至经历了矛盾性质的转化,近年来一部分矛盾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总的来说中日矛盾经历了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相对缓和期,21世纪前十年的矛盾上升期,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矛盾激化期,2014年两国矛盾激化到了“不能再激化”的危险局面,由此而出现了中日两国政府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和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会见,使中日关系迎来转机。

中日关系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堪称“世界级难题”之一。多年以来，国际问题研究者从不同观察角度，用各种分析方法，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在借鉴和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日关系的现实和未来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和见解，亟待得到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 一 中日关系的新的转机

2014 年 11 月，中日两国政府就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有关问题达成四点原则共识，11 月 10 日习主席与安倍首相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简短会见。“两国领导人的此次会见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历次会见有所不同。以往的会见或是在关系友好背景下实现，或者是在关系明显修复的条件下进行，而这次会见是在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陷入僵局、钓鱼岛争端处于紧张状态的形势下进行的，引起中日两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sup>①</sup>

国家之间难免会有矛盾，在正常情况下都属于“非对抗性矛盾”或“潜在的对抗性矛盾”。中日关系也不例外。然而，此次中日首脑会见的背景是中日矛盾围绕钓鱼岛等问题已经发展到现实的局部对抗状态，如听任其继续发展，就会走向现实的全面对抗状态，而中日走向现实的全面对抗，就意味着两国关系发生质变，从非敌非友关系演变成互为敌国关系，导致两国之间引发战争的危险，从而将可能给中日两国乃至世界和平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习主席应约与安倍首相举行会见，体现了一个大国领袖的崇高风范、宏达气度和大局外交思维。据笔者观察，四点原则共识和中日首脑会见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一）使中日关系持续两年多的空前严峻局面迎来重要转机

尽管中日两国没有也不可能靠一次首脑会见解决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但重要的是双方达成了要“管控”彼此之间分歧的原则共识，对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所称的“欧洲各国舆论认为日中两国在明天开战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在事实上确实存在擦枪走火危险的中日紧张关系起到了明显的降温和“退烧”作用。这无疑是中国领导人捍卫国家利益之举，维护地区稳定之举，对世界和平做出的重要贡献。

<sup>①</sup> 李薇：《2014 年中日关系是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复杂严峻的一年》，《世界知识》2015 年第 1 期。

## （二）避免了中日紧张局势对中国推进“APEC外交”的干扰

中国通过成功推进“APEC外交”，彰显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大国战略和大国担当，促进了中国与亚太主要国家双边关系的新发展，推动了“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战略，开辟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合作新领域，凸显了中国外交的全球性引领和局部性主导作用。

## （三）对推动中日之间开展各个级别、部门、领域的对话乃至地方交流起到了“带头”作用

例如，2014年11月15日，中日财长重启中断了两年零七个月的部长级对话；11月中旬，中日再次就启动“中日海上联络机制”进行磋商（或可能在2015年启动），也被认为是遵照首脑会见精神做出的反应；同年12月下旬，中日节能环保论坛在北京举行，这是11月中日首脑会见以来两国政府间首次举行的大型活动，双方还签订了41份开展企业间技术交流合作等文件。笔者认为，中日也应像中美不久前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那样，迅速启动两国环保部门的高级别对话并达成有关中日应对气候变化和地区性环境污染问题的协议。

## （四）对日本国内政治“一路向右”的走势产生一定的阻遏作用

这是因为虽然保守化、右倾化日益成为日本政治的主流，但日本不是铁板一块，其国内矛盾很大很多，包括政治上的右翼与左翼之争、鹰派与鸽派之争、军国主义余孽与和平主义力量之争。在历史问题上，既有极力否认侵略历史的右翼势力，也有承认对中国是侵略的大部分国民和积极主张对侵略历史进行反省的民间正义人士；在经济问题上，广大民众对所谓“安倍经济学”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此外，日本知识界对安倍推行《特定秘密保护法》非常担心，怕回到战前那种容不得不同声音和主张的恐怖时代。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极右势力视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推动日本社会“极右化”和“战前化”、进一步打压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甚至再次使日本成为破坏东亚地区稳定的策源地的良机（石原在2014年7月还在叫嚣要同中国“打一仗”）。然而，经过中日双方的外交努力和两国领导人的会见，及时地使中日关系得到缓和，既打击了日本极右好战势力，又支持了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2014年12月日本众议院大选中，以“次世代党”（主要成员都是80岁上下的老头子）为首的极右政治势力的缩水和泄气，也与他们失去了利用中日紧张关系升温这个“抓手”不无关系。

### (五) 回应了中日民众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主流民意

首脑会见给期盼中日政治关系走出迄今这种冰冻状态的中日两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带来了希望,也起到了争取被政治右倾化裹挟的部分日本国民的作用。近年来,尽管中日民众对方国家持好感的人数占比跌至复交以来最低,但是,认为两国关系“重要”的普通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比例却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七八十的高位。2014 年 8 月 9~10 日的日本广播协会(NHK)民调显示,认为有必要尽快举行日中首脑会谈的人数达 55%,日本民意主流依然是要以经济为主,对华政策宜稳健。总之,中日首脑会见的实现,回应了两国多数公众希望两国政府重视和改善关系的主流民意。

中日首脑会见虽然走出了两国关系改善的第一步,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中日之间的“冰层”之厚度和深度大大超出了 2006 年安倍第一次上台时中日之间的“冰层”,因此可以预计中日关系会很难再现当年那样“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的迅速改善过程。由于两国之间严重的“不信任感”依然没有完全消除,中日再次“破冰”将可能是一个“时快时迟”、“有进有退”的缓慢过程。要使两国关系平稳发展,逐步改善,防止横生枝节,2015 年的中日关系应该是“安静”、少上某些报纸的头条为好,以便给双方的相关部门留足相互磨合的空间,切实遵循和落实四点原则共识,相向而行,积水成渊,积量变为质变,推动两国关系走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轨道。

历史又翻过了一页。进入 2015 年,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将可能是双方进入在继续处理两国之间矛盾的同时,更加注重打理本国内部问题,在继续解决两国之间分歧的同时,更加注重寻求两国共同利益的“新常态”。换句话说,中日关系好比跷跷板,一边是相互合作与利用,一边是相互防范与牵制。近年来,相互防范与牵制这一边翘得越高,过度失衡,几乎成“垂直状态”;进入 2015 年,相互防范与牵制一边有可能下来一些,相互合作与利用一边则有可能上去一些,行稳致远,渐渐趋向准平衡状态。

## 二 中日关系的困境与变数

尽管已陷入 1972 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困难局面的中日关系开始企稳回升,但我们眼光回望,中日矛盾导致的两国关系困境历历在目,而且留下巨大负面遗产。中日政治关系僵冷,两国高层交往中断两年多,政治互信严重

受损，相互猜疑达到了复交以来的最高点，相互信任降到了复交以来的最低点，可以说已经陷入了“谁都不信谁”的严重信任危机，双方都把对方政府的每一个外交和内政行为都看成是针对己方（在事实上大部分确是如此，但未必是全部）。更为重要的是，两国政治互信的缺失和政治关系的恶化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各个方面。

### （一）中日经贸关系

中日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中日经济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两国经贸合作仍有较强互补性，在节能环保、绿色低碳、高新科技、财政金融、智能城市建设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大有可为。当前，陷入结构性困境的日本经济要走出衰退，实现振兴，开拓中国市场对其具有“性命攸关”的意义。另一方面，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要转方式、调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加快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也需要借力中日经贸合作的拓展和深化。

政治关系持续恶化，给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不仅影响中日两国经济的发展，影响持续多年的中日韩 FTA 谈判的进展，而且对亚洲经济增长活力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两国之间的双边经贸关系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全球性经贸关系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全球性产业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关系的削弱或破坏，必然带来“双输”的结果，却让“第三者”成了赢家，特别是美国，既坐收渔利，又获得牵制中国并削弱日本使之更“听话”的战略实惠。

中日经贸关系后退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从日方来看，日本企业界反映说，安倍首相再度上台后引导日本企业向东南亚跑、向印度跑、向非洲跑、向欧洲跑，绕了一大圈回头坐下来一算，不行，日本的合作重点还得在中国。<sup>①</sup> 因为东南亚、印度、非洲都还没有形成开展深入的产业合作所必需的上下游产业链、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素质较高的技术队伍。总之，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世界，产业才是经济的核心和基础，一个连续的、完善的产业链

<sup>①</sup> 后藤锦隆指出：安倍首相原先考虑，既然已经形成了对抗局面，那么日本企业就需要尽量避开中国，往东南亚方向发展。但东南亚也有具体情况，这一地区人口总量不大，但国家与民族众多、语言差异明显，各方利益很难调和，难以形成共识。这注定了安倍选择的是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事实上，虽然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新增投资大幅缩小了，可是总量并没有减少，相反还呈现继续扩大的态势。“这就是彼此经济的吸引力之所在，中国魅力之所在，也是日本企业界和日本政府都避不开的现实课题，日本企业界不赞成安倍搞对抗中国那一套。”参见《日本学者：未来“日本梦”要搭“中国梦”便车》，《中国青年报》2014年11月19日。

才是经济增长的活力所在。中日经贸关系倒退会成为中国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障碍，并对整个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因而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履行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大国责任问题。

## （二）历史问题和民众的相互感情

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感情持续下滑，降到了复交以来甚至是新中国诞生以来的最低点，特别是两国青年一代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差距不断扩大。历史问题归根结底是个教育问题。由于日本的教育大权掌握在统治者手里，他们在教科书中刻意淡化侵略历史，至于日本右翼更是美化、歪曲、否认历史事实。在这种教育和宣传的潜移默化之下，现在日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对历史问题就开始不买账了，说这是过去的事情，是我们爷爷辈干的事，跟我们这代人没关系，日本知识界的一部分人也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对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念念不忘”，甚至担心迄今仍念念不忘过去日本侵略罪行的中国一旦强大起来后会用同样方式来报复日本。然而，中国人民怎么能忘记那段残酷的史实！惨绝人寰的历史记录不仅真实地保存在中国的教科书、历史教育基地和抗日电视剧里，更牢牢地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成为我们从长辈那里传承下来的国家记忆。而这一切又与“淡忘”历史的日本中青年一代人之间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历史认识反差，这样世世代代下去，两国人民对历史认识的隔阂将越来越大，鸿沟会越来越深。

中日历史认识问题面临着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历史认识问题导致两国关系恶化，官方和民间的相互交流日益萎缩甚至隔断；另一方面，历史认识问题唯有通过两国官方和民间的持久的、大面积的相互交流，增进两大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感情，“让日本国民真正明白‘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或许双方以后更能坦诚相待”<sup>①</sup>。显然，如果两国民众长期处于相互疏远甚至隔断的状态，中日历史问题不仅不可能得到解决，反而会变得越来越难解决。

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中日两国能不能站在反法西斯、反军国主义、维护历史正义和世界和平的共同立场上，采取各种方式一起纪念这个重要的历史性日子？安倍在日本战败 70 周年之际能否做出一个与“村山谈话”不相违背的“安倍谈话”？这对长期困扰中日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既是一个挑战，也可能是一个机遇。

<sup>①</sup> 参见《日本学者：未来“日本梦”要搭“中国梦”便车》，《中国青年报》2014 年 11 月 19 日。

### （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中日紧张关系持续下去，必将给海洋和陆地的生态环境乃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带来严重后果。有研究表明，军备与战争的温室气体排放远远大于民生工业生产及其他人类活动。面对气候变化、极端天气、海洋污染、福岛核辐射扩散以及雾霾、干旱等环境危机，中日不能不考虑军备竞赛会使环境问题雪上加霜，战争则会给生态环境造成极严重的、不可逆的恶果。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sup>①</sup> 这意味着除去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之外，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也是当今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中日两国都应该把握好“捍卫人类道义”与“捍卫主权利益”之间的平衡。

### （四）战争并非耸人听闻

中日政治关系恶化引发军事对峙，曾达到被国际社会认为随时发生战争的剑拔弩张状态。虽然看来中日双方都不想正式开打，但在两国政府间的互信降至最低点的情况下，尽管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再表明希望通过和平磋商办法解决争端，日方却一直怀疑中国军队会化装成渔民突袭钓鱼岛，为此而大搞“夺岛”演习，反过来令中国军方感到它是在故意挑衅，借机走向军事大国，谋划对华战争。总之，双方都以最坏的揣度来评估对方政府的每一个行为，形成你想象对方有多坏，对方就真的有多坏，你越是把对方视为敌人，对方就越是真的变为敌人的恶性循环。尤其是日本右翼势力大肆夸张所谓“中国威胁”，在日本公众当中竭力煽动对中国的仇恨情绪的情况下，谁能保证“擦枪不走火”不演变成“擦枪走火”？谁能保证“擦枪走火”不演变成“大打出手”？谁能保证“大打出手”不演变成“局部战争”？正如英国政治家亚瑟·庞森比所言：“宣战之时，第一个牺牲的便是真相。”<sup>②</sup> 换句话说，即使日方打了“第一枪”，也会像当年卢沟桥事件那样倒打一耙，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总之，我们必须对日本一些好战势力保持高度的警觉，紧紧盯住他们的一举一动。虽然有人会问：一旦发生局部战争，谁能保证能源自给率只有4%的日本的能源运输线不受“卡喉”之痛？谁能保证日本五十几台目前基本处于停运状态的核电机组、核废料储存池、高大水坝等要害

①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习近平致贺信》，[http://news.xinhuanet.com/mrdx/? 2013-07/21/c\\_132559452.htm](http://news.xinhuanet.com/mrdx/? 2013-07/21/c_132559452.htm)。

② Edward Glaes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fare”, *Discussion Paper Number 2125*, 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ER), 2006, p. 39.

部位不受到常规武器攻击以致引发灾难性后果？然而，对于执政者而言，如果政治上有迫切需要，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发动战争，即使这一战争与他们的国家利益<sup>①</sup>相悖。

综上所述，中日首脑会见前的中日关系已发展到了接近“全面崩溃”、“坏到不能再坏”的状态，所谓“再坏”就是擦枪走火，就是战争。为此，早在 2013 年 9 月，习主席与安倍首相在出席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之际的短暂站立会见时就说：“近来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sup>②</sup> 随着中日关系的“严重困难”在 2014 年变本加厉，“火药味”更趋浓厚，中日双方通过艰难的谈判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和实现首脑会见，才使剑拔弩张的中日关系终于出现了转机。

然而，中日关系从上述困境中走出，仍然有着变数。在 2014 年 12 月安倍搞“突然袭击”式的众议院选举后，自民党与公明党执政联盟胜出，安倍晋三很可能再当四年首相。这就给安倍留下充足时间进行各种政治运作，特别是实现自己的夙愿——修正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尽管其推行修宪之路未必顺畅，但安倍继续推行以修改“和平宪法”为中心的右倾化路线，仍可能给中日关系增添新的变数。

根据日本宪法，修宪议案在众议院通过后需经参议院审核，若被参议院否决但经众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再次通过即可生效。自民党与公明党在众议院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议席，今后将可行使众议院表决权，使一些被参议院否决的议案生效。然而，根据日本宪法第 96 条规定，即使国会提议修宪，还要由国会发动公投议案并获得半数以上国民的赞成方可实施。为此，安倍认为需要发起一场“国民运动”，唤醒更多国民的修宪意愿。

事实上，与安倍意愿相违的另一场“国民运动”早已兴起。由大江健三郎（作家）、梅原猛（哲学家）等人发起组织的“九条会”，在日本全国呈燎原之势，在各行各业各地，冠有“九条会”名称的团体达 7500 个（2011 年数字）之多。<sup>③</sup> 然而，安倍却对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呼声置之不理，坚持要

① 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前副局长小原博雅认为，日本的核心国家利益包括：（1）东亚的稳定，（2）防止日本周边出现敌对国家，（3）打击威胁日本国民生命、财产的恐怖主义，（4）维持和加强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5）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6）海上航线的安全等六个方面。参见小原博雅：《日本走向何方》，加藤嘉一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年，第 93～98 页。

② [http://www.gov.cn/ldhd/2013-09/06/content\\_2482303.html](http://www.gov.cn/ldhd/2013-09/06/content_2482303.html)

③ 「『九条の会』と共鳴ダメ 調布市が後援拒否」、『東京新聞』2014 年 10 月 4 日。

修改宪法，其专制蛮横态度与当年日本军部领导人如出一辙<sup>①</sup>。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纪念日的2014年12月8日，日本作家协会发表声明称，近年来日本社会的氛围和73年前日本突然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气氛非常相似。“从惨痛历史的反省中重新出发的日本，正发生巨大的本质变化。日本政府通过实施《特定秘密保护法》，让军事、战略信息等不便公开的信息都能随意隐瞒民众。”该声明还批评安倍不断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曾经的强权国家和极端国策的重现”。<sup>②</sup>

70年前，日本在“战后体制”下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经济腾飞，带动了亚洲的发展繁荣，使日本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大国和现代化国家，然而，如今日本领导人却执意要摆脱这个曾给日本带来巨大好处的体制。那么，他们真的是为了创建一个比“战后体制”更符合当今日本国情的新体制吗？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是由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诸环节构成的。日本战后体制是对战前体制的“否定”，而战后体制延续了70年，战后宪法未经修改地实行了68年，确实出现了一些不能适应当今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缺陷和问题（例如不合理的选举制度），终将会出现一种新的体制、一部新的宪法取而代之，从而实现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为此，不改第九条的一般意义上的修宪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国内反对修宪的组织大多取名“九条会”而不是“护宪会”）。然而，历史在不断前进，“否定之否定”绝非意味着回到上一次“否定”之前的状态，而是周期性螺旋式的上升和前进的过程。具体到日本的发展道路，未来将可能出现的对战后体制的否定，是对战后体制的继承和变革这两者相统一的“扬弃”，而不是“回归”到那个可怕的战前体制。安倍却利用一般

<sup>①</sup> 1940年初，遭到中国人民奋力抵抗的日本侵略军日渐不支，资源短缺，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没有找到石油，致使能否将战争支撑下去成了问题，为此，日本军部下决心“南进”，以夺取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的石油，为此扬言要跟美国不惜一战，要以夏威夷群岛为界与美国“平分太平洋”。而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军部组织了主要由民间经济学家组成的“战时经济研究班”，着手分析被视为“假想敌国”的英美与日本之国力对比。当时参加“战时经济研究班”的成员、时任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被停职）有泽广巳等人在接到有关“英美的经济抗战力与日本的经济战持久力”的调研任务后，并没有像当时的媒体、御用学者那样一味迎合军部，而是通过冷静理性研究做出了“英美国力大大超过日本”和“不宜对美开战”的政策建言，并于1941年7月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上发表其报告。时任陆军总参谋长杉山元虽然承认“该报告的调查完美无缺”，但判定其内容“违背国策”，并做出将报告书“一烧了之”的处理。而伴随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冷静理性研究报告“一烧了之”的错误态度，迷信武力的日本军国主义为争夺西太平洋霸权居然向那个控制着石油产业链和运输线、国力数倍于己的美国发动战争，最终导致了日本被美国的原子弹和轰炸机“一烧了之”的惨祸。

<sup>②</sup> 「施行前に日本ベンクラブが政権批判の声明発表『特定秘密保護法』」、<http://no-border.co.jp/archives/29543/>。

意义上的修宪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修宪”中塞进自己的私货，将矛头直指宪法第九条。显然，把安倍所谓的“摆脱战后体制”与他修正侵略历史、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等行径结合起来看，不能不令人怀疑他对战后体制的“摆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战前体制的“回归”，让“曾经的强权国家和极端国策重现”，从石桥湛山所主张的“小日本主义”回归到石桥所批判的“大日本主义”<sup>①</sup>。日本右翼团体已公然要求安倍回归“传统”，并称“首相的观点跟我们的思维方式极其接近”<sup>②</sup>。

显然，安倍的“摆脱战后体制”带有浓厚的“回归传统”、“回归战前”的色彩，是背离历史前进方向的倒行逆施，不能不使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能否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产生极大担忧，同时也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只有共走和平发展道路，中日关系才能真正得到改善。

### 三 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

多年来，由于日本推行“借美制华”政策损害了中国核心利益，从而与坚定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中国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2005 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阐述日美结盟政策时称：“在政治及经济上中国大陆的力量均将强大化，因此美日在对华政策上将拥有共同的利害，亦即美日将会合作来牵制中国。从中长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sup>③</sup> 可以认为，萨缪尔·亨廷顿对近期、中长期日本对外政策的预言基本上与事实相符。当前，日本统治者以“日美合作牵制中国”思想为指针的“借美制华”政策，必然与中

① 日本著名思想家和评论家石桥湛山认为，“大日本主义是把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放在首位的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核心是“军事立国论”。而“小日本主义则是通过改革内政，促进个人自由和活力，立足于产业主义，以达到利国富民之目的”，核心是“产业立国论”。在战前军国主义狂潮翻滚的形势下，石桥主张的“小日本主义”被认为是“痴人说梦”，无法阻挡日本走上侵略战争道路。日本在二战中的惨败，恰恰证实了石桥“大日本主义幻想”必将破灭的预言。当许多日本人在战败之初为国家前途感到忧心忡忡之际，石桥却认为战败“正是实现小日本主义的绝好机会”。而战后日本经济和现代化发展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遵循“小日本主义”思想路线才得以实现的。参见：石桥湛山「大日本主義」、「東洋時論」1912 年 10 月号。

② Abe's base aims to restore past religious, patriotic values,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4/12/12/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abes-base-aims-to-restore-past-religious-patriotic-values/#.VKz6mNJAXIA>.

③ [http://japan.people.com.cn/2001/07/31/riiben?20010731\\_9415.html](http://japan.people.com.cn/2001/07/31/riiben?20010731_9415.html).

国对自身核心利益的坚定维护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sup>①</sup>对中国的核心利益作了清晰的细分：(1) 国家主权、(2) 国家安全<sup>②</sup>、(3) 领土完整、(4) 国家统一、(5) 中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6)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意味着中国所要维护的核心利益包括六个方面，为了全面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应注意六个方面的核心利益是相互联系的。正如沈丁立所指出：“这六项核心利益一方面相互关联，互为促进；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不同的利益互为牵制。”<sup>③</sup>

当前，中国在东海、南海与日本、菲律宾等国之间存在的岛屿主权和海域划分争端与上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之间都有联系。坚持以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以上争端，将可能对维护核心利益中的“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等均做出正面的贡献，起到促进的作用。反之，如果因为上述争端与相关国家之间形成长期对抗关系甚至爆发武力冲突，则意味着为了核心利益中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与核心利益中的“国家安全”、“国家统一”、“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形成互为牵制的局面。显然，为了落实中国外交的最大课题——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我们应致力于做到维护核心利益中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与维护核心利益中的“国家安全”、“国家统一”、“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相互牵制的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的国家，实际管辖领土与俄罗斯、印度等14个国家接壤。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在东海存在着海洋边界划分问题，与日本之间存在着钓鱼岛争端，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各国在南海存在着海洋边界划分与岛屿主权争端。以上问题的总和直接触动了中国核心利益之中的“国家主权”利益和“领土完整”利益，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其他四项核心利益，特别是影响到“国家安全”利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 根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包括12个要素：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

③ 沈丁立：《根据利益和问题区分敌友》，《环球时报》2014年8月27日。

至于以上每一项领土争端（例如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海域争端）相对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两项核心利益的总体而言，则属于局部利益。正如张蕴岭所说：“如果我们把周边看成一个整体……那就可以有一个客观的大局分析。”<sup>①</sup>

从 2012 年 4 月石原慎太郎与美国鹰派政治家共同策划“购岛”、日本政府于同年 9 月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以来，中日围绕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端和东海海域划界争端曾经发展到白热化的地步。显然，这个争端是由日本方面挑起的，而从中国方面看，所谓中日“岛争”也成为中国外交和军事斗争的一个空前突出的热点。虽然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端和东海海域划界争端相对于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总体利益而言，乃至相对于中国六大核心利益的总体利益而言，显然是属于“局部性核心利益”。<sup>②</sup>但是，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某些核心利益的局部性并不意味着它在各种核心利益当中受关注程度和战略优先顺序必然是靠后的，因为它是由于日本方面不断对我挑衅与“激怒”才使这个局部矛盾不断激化，而且上升到中日之间的“战略对峙”，同时钓鱼岛争端问题又与日本的错误历史认识问题存在着密切关系，致使中日“岛争”在一个时期上升为我们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斗争的“最前线”，中日矛盾从非对抗性矛盾上升到局部的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时期我与日方展开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然而，应该看到中日关系“现在处于一个历史性重构的长进程中，看待中国与周边关系，要放在这个百年重构的长进程中，要有长视野，要有战略耐心”<sup>③</sup>。此处所说的“百年重构的长进程”，恰与前文中萨缪尔·亨廷顿所言“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的预言相对应。那么，日本在什么条件下会走到“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的境地呢？从日本一贯追随先进、服膺强大的民族秉性来看，“这个条件”就是要让日本人的心理从目前的“一方面嫉妒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并没有对中国服气”的状态真正转变到对中国的先进和强大彻底服气的状态（当今日本人对华心理可概括为：对中国 GDP 超过日本的失落感，对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优越感，对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的恐惧感）。目前中国的 GDP 虽然超过了日本，但

① 张蕴岭：《中国周边地区局势和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4 年第 4 期。

② 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也有学者主张“有争议的领土不宜定位为‘核心利益’”。

③ 张蕴岭：《中国周边地区局势和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4 年第 4 期。

是经济“存量”依然不如日本，人均生产性财富只及日本的几分之一。<sup>①</sup> 朱建荣认为：“中国经济规模现在已经是日本的两倍，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GDP规模将接近美国，成为日本的3~4倍，届时日本就会调整好对华心理，目前的这种几近发泄的对华反感（主要体现在日本媒体的诱导和煽动上）会退潮。”<sup>②</sup> 丁学良则认为，“这个条件”就是中国再次成为“文明输出国”，而“要使当代中国对日本的冲击上升到‘黑船来航’对日本冲击的更高文明水平，中国本身就必须首先达到‘文明全面复兴’的高度”。<sup>③</sup> 这意味着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繁荣、政通人和、文明健康、以德服人、受到国际社会尊重的大国，不仅实现“中国梦”，而且引领“亚太梦”，正可谓“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乃德、智、力之和”。

从这个长远目标反观当前，我们应根据形势发展，审时度势，在全面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处理好维护各种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维护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对维护各种核心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力度和优先度进行适时的合理调整，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外交努力，努力化解热点问题，防止“热点”变成“爆点”，避免周边地区长期存在

① 金碚认为：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工业化水平，不仅应计算其经济流量规模，更要计算其经济存量规模。形象地说，如果要评估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力，经济流量估算的是“全家一年能挣多少钱”，而经济存量估算的是“全家总共拥有多少财富”。当今中国经济存量规模仍然较小。2008年，美国财富总量是中国的5.9倍，日本是中国的2.8倍；美国生产性财富（工业生产物蓄存量）是中国的3.8倍，日本是中国的2.4倍。而人均生产性财富，美国是中国的16倍，日本是中国的25倍。又据2012年联合国公布的一项衡量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富的新指标——“包容性财富指数”（Inclusive Wealth Index），日本的人均GDP指数并不及其他发达国家，但在人力成本、自然成本与生产成本三项指标综合后的人均“包容性财富指数”却排名第一，美国排名第二，中国在这项指数排名中排在第17位。参见金碚：《推进工业化仍是我国重要战略任务》，《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日；《包容性财富指数排名：日本第一，中国第十七》，<http://money.163.com/12/0619/12/84C3M30800253G87.html>。

② 朱建荣：《日本各阶层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共识网，2014年12月12日。

③ “黑船来航”是指1853年美国四艘军舰强行撞开封闭的日本国门的历史事件。当时，尽管日本国内“也有拒绝向西方开放的人士，有坚决认定‘祖宗章法万世不能更改、改了就是叛祖背宗’的人士，也有‘和魂洋技’的人士，也有‘引进宪法日本必亡’的，也有‘愤少愤青愤中’等等，但日本大多数决策者，还是达成了基本共识——美国‘黑船来航’对日本的冲击，其性质是先进对落后、开化对愚昧、强大对羸弱、未来对过去的冲击。学习美国冲击带来的启蒙要素和先进模式，日本才能走出闭塞深谷，参与人类进步主流，变成发达国家”。而所谓“中国文明全面复兴”，是指“实现至少是亚洲范围内更好的政治法律制度、更清廉的官员体系、更出色的技术创新、更好的经济制度、更好的教育体系、更好的人权保障、更自由的文艺创作环境、更持续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河湖、更安全的食品药品、更合理的社会福利体系、更融洽的民族关系”。参见丁学良：《中国对日并非“黑船来航”》，共识网，2014年11月28日。

与我们势不两立的“敌国”，以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 四 夯实中日关系的基础：加强民间交流

中日首脑会见走出了缓和中日关系的第一步。为了使今后中日关系走稳走好，继续缓和并改善下去，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加强中日民间交流。

发展中日关系必须坚持“以民为本”，两国人民友好是中日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两国民间交流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辩证法认为，矛盾双方既具有斗争性又具有同一性。就中日矛盾而言，在正常情况下（除去战争和相互隔绝状态），矛盾双方的斗争性主要体现在官方层面，而矛盾双方的同一性主要体现在民间层面。在两千年中日关系史中，无论两国在官方层面的斗争如何激烈，中日民间交流都不曾中断过，特别是在中日两国官方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中日民间交流显示出顽强的自身动力和生命力，在中日社会之间形成坚固的“同一性纽带”，依靠社会力量来填补官方关系的“苍白”和“空白”。

中日首脑会见以来，人们依然担心中日关系缓和乃至改善的趋势能否持久，能否继续向前发展。而当中日关系不确定性依然使盼望两国关系好起来的人们感到困惑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中日关系能否改善，既需要两国政治领导人的互信互动，也需要通过激发民间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互联网的力量，让业已走出“第一步”的两国关系改善进程继续前行。

##### （一）“以官促民”与“以民促官”相结合

在讨论民间交流对中日关系所起的作用时，人们往往会想到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民间交流超越官方关系对推动中日复交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留下了“以民促官”的佳话。但是，如果仔细回顾那段历史，不难发现当时在中日人员往来几乎隔绝的状态下，想要通过民间交流来促进两国官方关系发展谈何容易！事实恰恰是，先有了“以官促民”，之后才有所谓“以民促官”。一个典型例子是：1956 年 5~7 月，由梅兰芳率领的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成为战后中日民间交流的一场“破冰之旅”。但最初梅兰芳本人很不愿意访日，因为他曾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拒绝演出，“蓄须明志，息影舞台”。当周恩来总理得知梅兰芳不愿访日之后，就派人到梅兰芳家里进行“动员”，然而几次派人劝说无果，周恩来便亲自请梅兰芳和著名作家老舍等人一起吃饭。

席间，周恩来说，中日两国人民交往，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是有根本区别的，并鼓励梅兰芳说：“你去一定会引起轰动。让日本人民也看看中国的文化。只有你去最合适，这样才能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民间往来。”<sup>①</sup>

这个例子说明，为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中日两国政府应努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积极支持中日民间交流，防止两国政治、外交层面的矛盾扩大为两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与相互仇视。要着眼长远，加大投入，积极推进教育、文化、科技、学术、地方、媒体、青少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努力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特别是恢复和扩大中日学生赴对方国家的“修学旅行”，吸引两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民间友好交流的行列中来。

同时，这个例子也使人们想起周恩来总理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而亲力亲为，呕心沥血，立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我们要牢牢记住周总理关于“中日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在两国人民友好的基础上”的精辟论断，扎扎实实地推动中日民间交流。2013年1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时说，“中日两国领导人要像老一辈领导人那样，体现出国家责任、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这句话用在周恩来身上，确实是非常准确贴切的评价。

同样，中日民间交流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地方是中日两国合作最基层、最务实的层面，是两国合作成果惠及民生的最前沿。根深则本固。中日关系发展需要扎根地方、依靠地方、惠及地方。迄今中日两国已经建立了300多对友好城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时间里，中日两国地方政府和各地民众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合作领域涵盖方方面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人脉，这些都是今后重启和推进中日地方交流和民间交流可资利用的宝贵“资产”。

在地方交流中，地方媒体之间的交流值得大力加强。据朱建荣统计，“日本的全国性大报实际上在居住着60%以上人口的地方城市和乡村只能算‘小报’，因为各地方报纸平均占当地整体发行量的比例较大，而他们大都对极端言论保持一定距离。比如长野县，其境内销售、购读的《信浓每日新闻》的发行量占当地所有报纸发行量的近六成，右倾报纸《产经新闻》几乎无立锥

<sup>①</sup> 参见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19页。

之地。……而其他地方，除了大城市周围，也都是地方发行的报纸主导舆论”<sup>①</sup>。因此，从加强地方媒体交流入手，促使两国媒体共同担负起各自应尽的社会责任，客观全面地报道真实的中国和真实的日本，帮助两国民众更好地了解对方国家，建立符合真实的相互认知，更加重视与对方国家的友好关系，是加强两国民间交流的一个重要课题。

## （二）大力发展旅游业

当然，中日民间交流并非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因为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广阔、深入的发展阶段，每天近 2 万人往返于中日之间，他们很多都是公司雇员、学生、观光者，还有 70 多万华侨居住在日本，10 多万日本人长期居住在中国。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融入对方的社会，在中日之间发挥着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近年来尽管中日关系不好，在不少领域两国民间交流大幅度降温，然而无论在经贸、文化领域，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两国之间仍有很多人执着地开展着多种多样的民间交流活动。其中，特别需要提到中日两国的旅游业。2013 年年底安倍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日政治关系紧张，但中国赴日游客短时下降后很快恢复并迅速增长，这既与中日离得近、日元贬值等客观因素有关，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开放态度，去哪儿旅游是个人的自由选择。

“百闻不如一见。”中日两国人民只有通过相互交往增加对对方的了解，才能对对方的行为多一些理解。现在很多去日本旅游回来的中国人都说亲身感受到日本环境很干净，日本国民文化素质很高，对中国人很友好等。可以说，中国人普遍欣赏日本的现代化成就，并没有让对安倍内阁的厌恶根本改变我们对日本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总体评价。尤其是对日本有所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大都认同日本空气质量很好，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奶粉安全无毒，蔬菜水果没有农药残留，交通便利准时，社会和谐有序，贫富差距较小，官吏比较廉洁，等等。中国应继续学习日本，这种声音即使在两国政治关系恶化的时候，也没有遭到排斥。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来访中国游客的数量并未出现反弹，2014 年上半年是继续下降的。尽管这里有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多种原因，但也不能否认，日本主流媒体存在着“正和负的失衡”，就是多关注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很少报道甚至不报道有关中国的正面信息，这导致日本舆论所制造的中日关系氛

<sup>①</sup> 朱建荣：《日本各阶层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共识网，2014 年 12 月 12 日。

围，比中国舆论的这一氛围更严峻更纠结。

关于旅游，还有一点值得提起，这就是在互联网时代，旅游者往往会把自己在旅游过程中的所见所闻，通过在网上发“微博”与大家分享，不少人使用智能手机，利用当地的无线网即时给国内朋友发微信，使自己的“朋友圈”或“粉丝圈”在国内也能随时了解自己的旅游足迹，分享自己的旅游收获。可以想见，来华旅游的日本民众也很可能这样做。这意味着互联网发挥了促进两国人民通过旅游增进相互了解的“倍增器”的作用，促使旅游升华为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乃至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交流。

通过中日两国民间往来，使两国越来越多的人“越过”媒体宣传的局限性亲身感受对方国家的真实情况和风土人情，通过直接交往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感情，会有助于缓解多年积累起来的相互误解和相互厌恶的情绪化倾向，进而减轻两国政府和外交部门推出符合各自国家整体利益的理性外交政策所承受的国内压力。正如日本学者天儿慧所说：“两国首脑的此次会谈都顶住了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sup>①</sup>显然，要减少两国政府和外交部门推出符合国家利益的理性外交政策所承受的国内压力，一个根本的、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中日民间交流，缓和两国民众因为历史和钓鱼岛等问题产生的情绪化倾向，从而在双方国内形成有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舆情和气氛。

### （三）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文化交流持续发展，有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学术交流日益深入，中日两国的文学、音乐、绘画、戏曲、书法等文艺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由于文化产品经过数字化均可上网，因此，互联网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新平台，越来越多的日本的动漫、电子游戏等文化产品搭上互联网“快车”传到中国。

而且，在信息化时代，能够跨越海洋、国界和一切障碍的社交互联网作为中日民间交流“新平台”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走在中日互联网民间交流最前线的正是文化交流和电子商务。比如，中国的人民网年年主办“中国人游日本摄影大赛”，日本KDDI公司与中国的腾讯公司共同开发可供智能手机使用的AU版QQ，中国的淘宝网与雅虎日本合作建立跨国网购平台等等。当今，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在地理上

<sup>①</sup> 天儿慧：《中日会谈，态度比表情更重要》，《环球时报》2014年11月12日。只是不知道作者怎么知道中国的领导人也“顶住了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的？

互为邻邦的中日两国却相背而行，日益疏远，岂非有悖于时代进步的潮流和文明发展的规律吗？

中日政治关系恶化对两国文化交流活动造成了很大影响。在日本的书刊市场上，妖魔化中国的书刊层出不穷，铺天盖地，而正直的日本学者和作家通过出书或在媒体上发表意见，想要诚实地介绍中国则变得越来越困难。这种现象被日本坦普尔大学教授杰夫·金斯敦称为“文化战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中日关系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不能不引起人们高度的警觉。

## 五 增强中日关系的纽带：深化环保合作

2014年8月，《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撰文报道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文章的题目《环境亡国·中国》<sup>①</sup>令人感到震惊，颇有耸人听闻、哗众取宠之嫌。

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在中国确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虽然中国的GDP已列居世界第二，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日趋强大，但中国的腐败、贫富差距扩大、国民素质不高等问题也令人忧虑，而“令人忧虑”之最，当属环境污染问题了。现在，中国有很多人对“中国已经强大”充满自信，但中国其实是一个“强弱不均”的国家，而中国最大的弱项就是“环境”，中国可以说是一个“环境弱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sup>②</sup>，雾霾等环境污染与广大人民对健康的生存环境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为突出的内部矛盾，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升级版”。

反观日本，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强弱不均”国家，日本最大的弱项是人口少子化和超老龄化加上相当于GDP约2.5倍的公共债务，“对于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来说，最重要的课题不是中国，也不是朝鲜，而是少子化问题”<sup>③</sup>。因此，常被学者所指的中日“强强型关系”实际上是两个“强弱不均”国家之间的关系。

① 「環境亡国・中国『不! (NO)』突き付けた市民」、『日本経済新聞』2014年8月4日。

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环境承载能力已达或接近上限》，[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xfly/2014-12-11/content\\_12880808.html](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xfly/2014-12-11/content_12880808.html)。

③ 虽然现在日本人口为1.27亿，然而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调查，预计2100年日本人口会减少到5000万以下。人口减少，争取优秀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而将自卫队作为人生选择的人又不多。参见《日本学者：未来“日本梦”要搭“中国梦”便车》，《中国青年报》2014年11月19日。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在中日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对日本“不战而胜”，首先要克服自身的弱项，首先要防止走上“环境弱国”之路。

环境问题正在“弱化”中国作为大国的竞争力。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未来强国国力竞争将集中在四个方面：教育、基础设施、法制程度和环境。”现在中国的环境问题要比日本、美国等大国严重得多，水、空气质量、土地资源等都因经济粗放式发展遭受很大破坏。环境安全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短板”，在今后大国竞争中，我们最可能输掉的是环境，而不是军事。

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孤立的，也是全球环境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发生在中国的极端天气、极端干旱等问题来源于全球气候变暖，而气候变暖是全人类面临的课题。中国政府签署《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等多项有关环保的国际公约，不断加强同世界各国、地区和国际组织在环保领域的合作。2014年7月，中美双方在战略对话框架下举行了气候变化政策对话，签署了绿色合作伙伴结对计划。同样，中日两国作为身处东亚地区的邻国，有更多的理由加强环保合作。2015年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将达到4.5万亿元，年均增长将超过15%。中国强力推进节能减排，加快污染治理，必将产生巨大的节能环保产业市场，不仅给中国，也将会给拥有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的日本等世界各国的企业带来商机。

可以认为，追求绝对的自身传统（军事）安全会成为割裂中日两国的利刃，而追求共同的非传统安全（环境问题、海上运输线的共同安全等）会成为连接中日两国的纽带。

## 六 战争与和平：中日矛盾的焦点

两千多年来中日关系史的特点在于，两国经过“中国强日本弱，以和平与友好交流为基调的强弱型”关系，“日本强中国弱，以战争与弱肉强食为基调的弱强型”关系，战后两国开始出现双方都在走向强大的“强强型”关系，但是至今尚未出现中国全面强于日本的、明显的“中国强日本弱”关系。为此，中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崛起，“历史上看，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经常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则往往恐惧于前者，导致了无穷的战争和冲突”。因此，“中国与这些大国交往，

要解决的不仅是贸易问题，更重要的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sup>①</sup>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中日矛盾的焦点。看当今中日之间的主要问题：历史上日本的战争、战败与战后是“过去的”战争与和平问题；钓鱼岛争端是“现在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安倍“修宪”使日本成为“能进行战争的国家”，是“将来的”战争与和平问题；2014 年安倍，多次提出“积极和平主义”，其实与 100 年前一战肇事者们所做的“和平秀”在逻辑上并无二致，这就是“和平诚可贵，不惜用战争来捍卫它”；2015 年夏季，据报道“安倍将借二战周年纪念之际发表其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sup>②</sup>，令人拭目以待。总之，中日之间的几乎所有主要问题，都牵连到同一个问题，这就是战争与和平。2014 年 12 月 22 日，日本媒体大肆炒作中国在位于浙江省鳌江口外仅 30 海里的南麂岛建设军事设施一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也对日媒报道进行呼应，表示“对中国军方的动向高度关注”。安倍内阁为引导民意支持其不断强化的防卫动作，进而达到“修宪”的目的，依然在不断炮制“中国威胁论”话题。

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和首脑会见后，两国之间爆发的第一次政治风波出现在军事领域，绝非偶然。在军事领域的矛盾是中日矛盾中最深刻、最尖锐、最具有刚性的结构性矛盾。为了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固然需要加强民间交流，加强环保合作，但是，更重要的是解决好“战争与和平”这个根本问题。

#### （一）中国的对日“军事斗争准备”应提升到军事创新境界

中日首脑会见后，尽管中日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日本“借美制华”的军事战略并没有改变，中国仍然需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而且在“军事斗争准备”方面也要“转方式、调结构”，注意保护环境，从数量型的军备走向质量型的军备，大力推进军事创新。

习近平主席在 2014 年 8 月指出，我们要“看到世界军事领域发展变化走向，看到世界新军事革命重大影响，形成科学的认识和判断，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军事创新”<sup>③</sup>。笔者理解“军事创新”的基本含义是：由于技术革新，使过去不可能实现的各种新武器等组成的新军事系统的开发成为可能，进而引

① 郑永年：《中国大外交时代的来临》，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 年 12 月 23 日。

② 《日媒：重要节点多 2015 年仍是中日关系敏感年》，<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1228/611484.shtml>。

③ 《习近平：准确把握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 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军事创新》，[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8/30/e\\_1112294869.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8/30/e_1112294869.htm)。

发对各种新武器等组成的军事系统加以运用的战略战术、作战思想、战争模式、组织体制、军事管理发生相应的深刻变革。

根据“军事创新”的基本含义，可以看出：“军事创新”的原点在自然科学革新，“军事创新”的内涵涉及军事思想、军事管理、军事组织等等，则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支持，总之，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技术构成了“军事创新”的核心，构成了一国的经济力、军事力乃至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

## （二）注意应对日美“军事技术同盟”的挑战

在推进军事创新过程中，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军事技术创新与民用技术创新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内在机制。例如，早在1983年作为军事技术大国的美国就要求作为民用技术大国的日本向美国提供“军事技术”，包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光通信、砷化镓半导体、电荷耦合器件、碳纤维、精细陶瓷、电致发光显示板、机器人等。<sup>①</sup>长期以来，美国军方紧盯高度重视研发的日本民间企业<sup>②</sup>，从其民用技术开发活动中吸取创新武器技术。这个事实表明，在电子、材料、激光、精密机械等尖端技术领域中，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分界，而是既具个性，又有共性，既互相区别，又可互相利用和转化。例如，互联网最初就是美国为了军事用途开发出来的，现在已成为军事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的典型案例，反之，民用技术也是发掘具有军事利用价值的先进技术宝库，尤其是战后日本在很多民用技术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吸引了美国军方的高度关注。众所周知，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工业和制造业成为产生技术创新最多的产业领域，而日本的工业和制造业民间企业所开发的很多民用技术则成为可望发掘众多具有军用价值的尖端技术的“苗子”，例如美国开发隐形轰炸机等隐形武器使用的涂料，就是从日本一家中小企业提供的用于家用微波炉的电波吸收材料样品中得到启发。美国与拥有领先于世界的民用技术实力的日本结成“技术同盟”，成为它在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夺取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借力日本的民用技术开发新式武器的事例启发我们：要高度重视高新技术的军民两用性和转用性，使军事科技创新与民用科技创新达到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相互刺激创新灵感的互动境界，为达到这种境界，必然要推进整

<sup>①</sup> 冯昭奎：《美国要日本提供哪些军事技术》，《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1984年第2期。

<sup>②</sup> 日本的科研投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4%，其中77%来自民间企业，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科研投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水平只有2.3%；全球十大发明型企业中，有八家在日本，其专利发明集中在电子、机械、精细化工、纳米新材料、能源与环保等高科技行业。

个国家的科技体制的创新。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正是“创新”成为美国维持强大军事力量的原动力。美国不仅依靠从全世界吸引优秀科技人才等措施提高其军事科技研究水平,而且通过加强“盎格鲁—撒克逊五国同盟”<sup>①</sup>的紧密的军事技术合作和协同关系,通过加强与日本之间的军民两用技术的交流与合作,来增强其作为西方军事技术霸权国的地位。这意味着中国与之进行军事创新竞赛的对手是以美国为首、包括日本在内的大半个西方阵营。

战争的逻辑在本质上就是矛盾运动的逻辑。“有矛必有盾”,矛越锐,盾越坚;盾越坚,矛更锐。恩格斯说过:“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第一,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获得最后胜利。”<sup>②</sup>

当前,“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机遇”<sup>③</sup>。从科技创新这个原点和基础出发,依靠自主创新掌握最先进的高精尖武器的核心技术,构筑日新月异的武器系统、与时俱进的军事战略、超越传统的作战思想、灵活机动的军事指挥和管理体制,努力打破“瓦森纳国家群”<sup>④</sup>对我的技术封锁,加强武器技术乃至武器概念的创新,同时减少资源被消耗在购置大量“几年不用就变成难以处理的垃圾”的二三流武器上。<sup>⑤</sup>

① “盎格鲁—撒克逊五国同盟”已经制定、设立的计划和组织有:美英加澳陆军计划(ABCA)、航空航天相互运用性协议会(ASIC)、三项海军关联计划、合同通信电子委员会(CCEB)、多国间相互运用性协议会(MIC)、技术协作计划(TTCP)等。<http://www.jcs.mil/j6/cceb/multiforahandbook2006.pdf>.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3页。

③ 《习近平点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http://money.163.com/14/0604/02/9TS20NV/100253BOH.html>。

④ 《瓦森纳协定》又称瓦森纳安排机制,全称为《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 and Technologies),目前共有包括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40个成员国。瓦森纳安排机制经过多次修订,目前成为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的主要的“指导性文件”。

⑤ 当今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很快。比如一架高达几千万美元的最先进的战斗机,其技术寿命也只有5~8年。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几千架一次也未参战过的旧式战斗机被抛弃在美国的亚利桑那沙漠中的巨大空军基地里,全成了难以处置的废物。如今,如何处理废旧核武器,成为在冷战时期大搞核军备竞赛的美国、俄罗斯的沉重负担(目前大约有30艘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退役的潜艇仍然停泊在远东的一些港口。自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方面就有两种担心,一是这些废旧潜艇会污染海洋,二是艇上的核材料将被偷盗)。

### （三）“中日必有一战”将是“中日创新之战”

当今，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十年前，美国五角大楼预计，随着全球人口在2050年向100亿大关逼近，战争将在2020年定义人类生活。这是“所有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源”。“到2020年，毫无疑问将会有大事发生。随着地球的负载能力减弱，一种古老的模式将重新出现：世界将爆发对食品、水与能源进行争夺的全面战争，战争将定义人类的生活。”然而，越来越多是人们开始质疑战争是否是解决世界问题的最好手段，特别是质疑和批评美国和北约对动用战争手段的轻率态度（例如对伊拉克、对阿富汗、对科索沃、对利比亚），因为战争将加速消耗资源并破坏已经脆弱不堪的自然环境，当今日本右翼势力推行战争擦边球政策的最大危险就是只想着右翼的政治理念和当下执政者的政治利益而缺乏“为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着想”的人类良知。这个“人类良知”就是：在地球环境已经不堪忍受产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沉重负荷的情况下，不要再雪上加霜，把一个打得稀烂的地球留给后代。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美国学者提出2012~2022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中美创新之战”，因为理智最终总是会占上风，认识到应该推动创新与技术的转变，促使创新与技术的着眼点置于解决人类面临的真正重大的问题上：最重要的是人类的生存而非杀戮。<sup>①</sup>三年前，中国一位军队领导人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说：“中国搞经济建设是为了解决好13亿人民的生活，使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好，而不是拿这个钱去搞武器装备，去挑战美国。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出中国人民生活水平12倍，如果我们拿这个钱去搞武器装备挑战美国，中国老百姓也不会答应。”<sup>②</sup>总之，针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搞军备竞赛是下策，积极推进包括军事创新在内的“创新竞赛”才是上策，而所谓“中日必有一战”也必将是“中日创新之战”。

<sup>①</sup> 《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美之间的创新之战》，<http://finance.ifeng.com/usstock/mgpl/20120111/5437198.shtml>。

<sup>②</sup> 《陈炳德称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沿海无导弹部署》，《环球时报》2011年5月20日。

## The Dialectic Analysis of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Feng Zhaokui

The development of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is in the cycle of contradiction motion. The tension in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has gradually intensified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reaching the peak of the crisis in the year of 2014. The Sino – Japanese four – point principle agreement and meeting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leaders marked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turning of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year 2015, the most optimistic situation of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will be relatively “quiet”, with the four – point principle agreement well observed and implemented an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kept on the track of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More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strengthen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 preventing the growth of the contradiction and hostility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people fostered by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conflicts between governments. Sino – Japanese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ould be promoted, with the aim of the cooperation of non – 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becoming ties of friendship. More importantly, the “war and peace” issu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hould be well solved, in order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of “China and Japan will inevitably go to war” to that of “China and Japan will be in the competition of innovation”.

## 中日関係の弁証法的解析

馮 昭奎

中日関係の発展と変化は、何度も繰り返される矛盾に満ちた変化のプロセスである。2010 年代以来、中日間の矛盾が日増しに激化され、2014 年は、両国の矛盾が「これ以上激化しようのない」非常に危険な局面に直面した。中日両国政府は首脳会見を行い、四つの原則的共通認識を取りまとめることにより、二年に及び厳しい状況に置かれた両国関係は重要な転機を迎えた。2015 年の中日関係は「静か」な状況で推移すべきである。四つの原則的共通認識をしっかりと遵守し、両国関係を平和と発展・協力・ウィンウィンの軌道のうえで推し進めるべきである。両国の政治と外交レベルの矛盾が両国国民の間の矛盾と相互敵視に発展することがないように、中日両国の民間交流を強化すべきである。また、中日間の環境保護協力を強化すべきであり、環境問題など非伝統的安全保障の協力を両国間の友好的な紐帯とするべきである。最も重要なのは、中日間の「戦争と平和」問題を解決することであり、いわゆる「中日は必ず戦う」という状況から「中日イノベーションの戦い」へと変えさせることである。

(责任编辑: 林 昶)